

大变局

1644

明清易代关键事件调查

1644年之前，祸患已种下

东林党的官员审核引发激烈政治动荡
崇祯皇帝的变革如何加速了明朝崩溃

袁崇焕斩毛文龙的细节揭秘

吴三桂、李自成、多尔衮
山海关前的生死博弈

揭秘300多年未决悬案，拨开历史的面纱

青◎著

4最新修订
图文版

《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鼎力推荐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Press

大变局

1644

——明清易代关键事件调查——

汗青◎著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644 大变局——明清易代关键事件调查/汗青著. —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4. 10
ISBN 978 - 7 - 5504 - 1587 - 4

I. ①1… II. ①汗… III. ①中国历史—研究—明代 IV. ①K248. 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13126 号

1644 大变局——明清易代关键事件调查

1644DABIANJU——MINGQING YIDAI GUANJIAN SHIJIAN DIAOCHA

汗 青 著

责任编辑:张明星

助理编辑:李 筱

特约编辑:王云强

封面设计:李尘工作室

责任印制:封俊川

出版发行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四川省成都市光华村街 55 号)
网 址	http://www.bookcj.com
电子邮件	bookcj@foxmail.com
邮政编码	610074
电 话	028 - 87353785 87352368
印 刷	四川森林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 × 240mm
印 张	19. 5
字 数	485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504 - 1587 - 4
定 价	38. 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自序

这篇稿子，字数不多，却写了好几年。

最初写下这些文字，是因为前几年清明时分去袁督师坟上祭奠时，突然省起快到甲申年了，既而觉得三百多年前的那个甲申年，有不少事可以、也应该写上一写。

写之初，脑子里对全篇的框架还比较清楚，大约是想把崇祯十七年，也就是1644年（甲申年）前后的一些关键的人和事说一下。但在下笔的时候，我没有按顺序写，只是按草拟的简单目录，以独立的人或事为单位一篇篇地写。

写了几篇后，却逐渐发现要把甲申之变说清楚，很难不牵涉崇祯朝之前的种种事端，尤其如士风及士人思想演变这类问题，甚至要把嘉靖、万历朝的一些人与事都牵扯进来，于是写着写着摊子越来越大，到最后不但所叙主题不甚统一，甚至连体例和文风都起了变化，以致前后所成诸篇的体例和风格很不统一。于是曾经有一段时间颇以此为难，不知道是该修改一下统一统全稿呢，还是推倒一部分重写。后来突然有一天想明白了，其实可以不管那么多的，只要把事儿写清楚，把想说的话都说了，体例和文风不一样就不一样了吧，当一个随笔集子就是了。

于是我把稿子归成了上、下两卷，上卷写的大约是明朝士风和意识形态的演变过程，及其对政局、政体乃至对整个明帝国兴衰的影响，其中的人、事自嘉靖起到南明弘光止；下篇则主要说的是崇祯朝的兵事，时间则大致集中在崇

祯朝初和崇祯朝末。

然后就这么拉拉杂杂地一路写了下来。总的来说，全书结构是比较松散的，有个别章节甚至可以算独立篇章，因此就当初起笔时的构思来看，现在这个结构是很失败的，甚至都谈不上什么结构，最多也只能算是个有大主题的随笔集。

读史论史，肯定会涉及自己的观念和态度问题，按刘知几的分法，这大约应该划在“史识”之内。

中国之史以及治史，经常一个时期一个时期地为意识形态所左右，时或缺乏治史应有的客观态度，很多时候治史者往往观点先行，然后再去寻找合适的材料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当然，这原本也没什么大错，人不可能没有观点，也不可能不受当时社会环境和思潮的影响。但即便这样，在动手时也应先遵循不破不立的基本原则，在碰到与自己观点相悖又破之不去的问题时，更需要冷静客观地去看，而不是采取避而不谈、曲解史料，甚至篡改史料等手法来维持、支持自己的观点。客气地说，这是一种不客观的“唯心”态度；不客气地说，这是学风问题。

明清易代，是中国史上一个相当重要的转折点，至于为什么重要、有什么后果等，已经有很多大家论著，各种观点都有，我想就不需要再重复阐述了。又鉴于明清易代的论著众多，其中很多大问题、大关节处，也都有前辈学人们做了各种相当出色的考、论，因此我在看书时，更多的是在关注那个短暂而动荡剧烈的历史时期中一些细小的人和事，尤其感兴趣的是在这种大动荡环境中，支持那些士人、朝臣们个人行为的基础，也就是支持他们行为的内在因素和思想。这可能比较接近历史心理学的范畴。

我一直相信一个人要做什么事，应该基本是在自身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指导下完成的。因为无论他做什么，第一个要面对的人都将是他自己，他首先要为自己的行为给自己一个交代，说服自己这样做是合理的，哪怕是自欺欺人，也要编出个理由来让自己接受。而要提供一个合理的理由，就需要一个完整的、能自洽的体系，这个体系或简朴或复杂，但无论如何，这肯定是个能自洽的体系。

在这点上，最具矛盾又最有代表性之一的问题，便是历史上常见的改朝换代问题。中国历史上对这种在历史进程中的普遍现象的最著名的解释性理论，便是那个相当神奇的“天命说”。

在没有这个理论前，每当一个旧君、旧皇朝被推翻，一位新君建立了一个新皇朝君临天下时，那些旧君手下的大臣和子民们就将面临一个很尴尬的选

择：想要尽忠保全名节，那大伙儿都得以死殉国，你不死就是不忠，最少也得像不食周黍的伯夷那样吧？不过可惜的是，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皇土，越往后，这条路走通的可能性就越小，伯夷就是这样被饿死的。

所以无论是当官的还是小老百姓，真要尽忠尽孝的话，只怕最后就剩不了几个活人了，这显然是不能被人接受的，于是，“天命说”就顺理成章地出炉了。

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讲究天人合一，讲究不可逆天而行、倒行逆施等。因此一旦当新旧政权的更替是所谓的天命、天意时，那么效忠故主固然是忠孝之道，但顺应天命为新君效力，也同样是一种无比正确且非常光荣的行为。

正所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款绝对天才构思的天命理论的出现，顿时使大家豁然开朗，一起摆脱了那种不死便是不忠不孝的尴尬困境，不但身家性命都得以保全，还可以继续兴高采烈地当官，继续为新朝新君尽忠效力。当然了，也要顺便为百姓的生计而忙碌一下，尽管每个末代皇朝大部分当官的死活似乎和老百姓的关系都不是很大，甚至他们死了也许更好点。

在明清易代这个特殊时期中，这种因改朝换代而产生的道德上的矛盾格外尖锐，甚至于“天命说”还出了点不大不小的差错，导致很多人虽然及时使用了这一天才学说，但最终却依然没有摆脱那个“忠孝”问题。

他们要面对的问题，其一是明的后来者——清，它是个异族，这犯了中国传统思想中“夷夏大防”这条大忌；其二是清的文化和文明程度比之明，可以说是相当的落后，几乎尚处于某种原始状态。因此无论是要接受还是承认这种被落后文化和氏族所统治的局面，都有很大的难度。

再一个就是在这两者之间，夹杂了一个极其短命的李自成大顺朝，它确实承担了打倒大明朝的担子，可随后又迅速退出了历史舞台，而且无论在清还是在明，他都是敌人。因此对那些在清朝介入以前以“天命说”来对待大顺朝，并以此为基础进而效忠新君李自成的人们，这是非常狼狈且不好交代的一个问题，无论在明在清，他们都不是那么好交代的。

天才构思的“天命说”，因为李自成的介入而和当时的人们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这个玩笑让相当部分人非常尴尬，不但让他们无法面对世人和故主新君，甚至于无法面对自己。

因此，在这个时期里，出现了一些表面上看很令人困惑的人和事，譬如大学士李建泰、在陕抗清的总兵官姜瓖等人。他们都是在李自成进军北京时望风而降，又都在李自成败退时反叛大顺朝投向了清朝，可后来又一起开始反清复明，如果按照一般的逻辑推断，基本就可以说这两位肯定是软骨头的叛徒胚

子，一旦清军重兵压境，再加以高官厚禄诱惑，他们再次投降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可问题恰恰就在于他们之后突然一起变成了硬骨头，重兵压境和高官厚禄在一夕之间突然丧失了之前的种种魔力，这两位仁兄愣是软硬不吃、死活不降，坚决抗清到底，到最后兵败自杀。尤其有意思的是那位李建泰，据说他有五十位小妾，破城时他去逐一询问有没有人愿意和他一起殉国，结果那些小妾们大肆嘲笑了他一番后哄然散去，最后只余他一人孤零零地求死。细想起来，此事实任颇有些意味。

与此相近的还有那位投靠清廷后一手制造了“嘉定三屠”的李成栋，此人以大肆屠杀南明军队和反抗清军的汉族百姓闻名，在清廷步步高升，然而却在其小妾为激励他反清复明自杀后，突然“冲冠一怒为红颜”，对大明朝开始忠义起来，树起了大旗起兵反清，最后也是兵败身亡。

如果我们仔细求诸史籍，在这个时期中像此类匪夷所思、很难按一般逻辑去预料及解释的人和事之多，足以让人瞠目结舌。

一直以来有所谓治明清史之难，莫过于资料繁多一说。然而，当我们真正面对那么多由前人记叙构成的历史时，最终还是会发现，我们看见的依然仅仅是一小部分历史的残砖碎瓦而已，大多时候甚至想拼出一幅完整的画面都很困难。譬如，我们基本上再也无法确切地知道，当时当地的那些人们，像姜瓖、李建泰、李成栋等，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

不过，我想我们至少还可以从一个人而不是一个符号的角度，去设身处地地体会一下，这些人当时都在想些什么，那会儿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虽然因为有思想才导致了人是世界上最难以捉摸的动物这一现状，但我相信，也正是因为有思想，才使每个人的行为会有其合理的逻辑基础存在，这多少可以帮助我们对他们行为的动机，做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推演。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也都是亲历史。

我们可以尝试自己去触摸历史。

前 言

中国人的纪年，用的是干支纪年法，追溯起来源远流长。

传说当年黄帝命大桡氏造纪年，于是就有了天干地支。我们的每一年，都是用一个天干配一个地支，一个循环六十年，俗称为一个花甲子。这六十年一个花甲子里，又有五个小循环，每十二年为一轮，每年都用一种动物来代表，于是又有了十二生肖。

例如甲申年，其中的“甲”是天干，“申”是地支。

中国历史上很多大事件，都直接以干支纪年来称呼，如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赔款等。

不过就影响而言，这些恐怕都没有三百六十多年前那个甲申年发生的事件来得那么大，那么深，那么久远，以至令此后无数人难以释怀。同样，三百六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也如无数先人一般，对那个甲申年所发生的事，无法释怀。

那个甲申年——大明崇祯十七年，是一个真正的多事之秋，一个“天崩地解”（《南雷文约》）的年代。

那一年，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汉人皇朝灭亡。

那一年，李自成进京，崇祯缢死，明室倾覆，吴三桂倒戈，清入关。自此以后，神州无复汉衣冠几达三百年。

那一年所发生的大小事件，差不多每一件都足以让历史进程大大地

改变。

关于明朝的灭亡，原因众多，清人在《明史·神宗本纪》中写有这么一句话：“明之亡实亡于神宗。”清高宗乾隆则在他所撰的《明长陵神功圣德碑》中道：“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及天启时阉宦之专横，大臣志在禄位金钱，百官专务钻营阿谀。”这些关于明朝灭亡主要原因的分析评论，和众多后世史家之见并无二致，即明亡之征起于神宗，此遂为一时公论，故近代明清史研究奠基人之一的孟森先生在评崇祯时道：“思宗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也，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明清史讲义》）

任何一个王朝最终必然会灭亡。如孟森先生所言，明朝自神宗以后，随时都有可能灭亡。但它在崇祯手中灭亡，却实在是个偶然，或者也可以说是由无数偶然累积起来的结果，可它依然不是必然的。（《南明史》）

我想做的，是把压在大明王朝这匹骆驼背上那个庞大草堆中的一部分，拣出来仔细翻看。

也许，谁也无法说清楚是在哪一根稻草加上去之后，这匹庞大的骆驼终于倒了下去。

但我们至少可以说，就是这些稻草，压垮了这匹骆驼。

洛伦佐说，亚玛逊河边的一只蝴蝶轻轻扇动了几下翅膀，最后密西西比河上掀起了一场龙卷风。

目 录

上卷 崩解之兆

- 第一章 天朝上国的荒唐 / 003
- 第二章 蝴蝶的翅膀——明季士风 / 021
- 第三章 东林党、“阉党”和明清之际的党争
——从定策风波及阮马公案看明季东林党人之失 / 059

下卷 天崩地解

- 第一章 崇祯十七年缺失的朝贺 / 097
- 第二章 因为欠饷而死的巡抚
——粮饷、官兵和流寇 / 102
- 第三章 袁毛公案
——袁崇焕“斩帅”及东江崩溃辨析 / 111
- 第四章 清军破关和明军抗清将帅之死 / 154
- 第五章 崇祯帝的南迁之议 / 195

第六章 山海关大战和神州易手 / 202

附录一 阮大铖入“钦定逆案”诸事考辨

——自阮、魏争吏垣事看天启四年东林党祸及明季东林党之失 / 248

附录二 关外建州遗事 / 273

附录三 明朝皇帝世系图 / 294

附录四 大明朝及清朝综合国力对比 / 295

附录五 明代历任内阁首辅 / 296

附录六 东林党成员名单 / 300



崩解之兆

第一章 天朝上国的荒唐

大明天启七年（1627年），明熹宗朱由校驾崩，时年二十三岁。

熹宗先后育有三男二女，不过因为各种原因，最后无一长成，临终时遗诏，由其素来亲近的五弟信王继承大统。

于是他那位年仅十七岁的弟弟信王登基，成了大明皇帝。

这位少年天子上台后不动声色，一时也瞧不出什么兆头来。可一转眼不过数月，他便以只身之力就把权倾朝野的“九千岁”魏忠贤打入了十八层地狱，魏忠贤那覆盖了差不多整个朝廷的庞大集团也在瞬间灰飞烟灭，史称此事为“钦定逆案”。当时大明朝上上下下都说，当今天子圣明，大明中兴有望。

这位丝毫不比康熙除鳌拜逊色的少年天子的年号，叫崇祯。

在明朝皇帝中，崇祯帝确实是一位严于律己、励精图治的皇帝，^①其操劳国事之勤奋程度，甚至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堪与之比肩者寥寥无几。

① 关于帝王的称呼，历史上有称年号者，也有称庙号者，其随时而定。通常而言，明清两朝称年号者多，也比较容易记，如明世宗为嘉靖、明神宗为万历、清圣祖为康熙等，故本书在涉及帝王时，起始会交代庙号，通常情况下则以年号代称。又，明末代皇帝朱由检的年号是崇祯，《明史》称其庄烈愍皇帝，弘光朝追谥为思宗烈皇帝，其后又尝改谥毅宗，清朝则追谥为怀宗端皇帝，而后世有称庄烈帝、思宗、烈皇帝者，少有采怀宗端皇帝一说。为统一起见，本书称其为崇祯，庙号则以思宗烈皇帝行。

虽然如此，这大明朝到底还是在他的手上亡掉了。



崇禎帝

而崇禎帝的哥哥，传位给崇禎的那位天启帝熹宗朱由校，我们首先可以肯定他是位心灵手巧的皇帝，甚至可能是位很有天赋的发明家。但从他身为一位国家统治者的角度看，他则十分不幸地对治理国家完全没有兴趣，而是更热衷于自己木工手艺的提高，宁愿去做一个出色的木匠。因此几乎所有的国家事务，他基本都交给自己十分宠信的宦官们，譬如魏忠贤这样的人去办理。

至于崇禎和天启两兄弟的爷爷，就是明朝的第十四代皇帝，一样赫赫有名的荒唐皇帝万历，也就是明神宗朱翊钧；他们的父亲，则是那位一人身涉“争国本”事件和“明宫三大案”的老太子、短命皇帝——明光宗朱常洛。这位只在位一个月的短命皇帝，却一人身系明廷三大著名宫廷疑案和一桩使得朝野纷争几十年的公案，这在历史上也是罕见得很。

朱常洛生于万历十年（1582年）八月，为万历帝恭妃王氏所生，因中宫王皇后无子嗣，所以他是正牌的皇长子，也是理所当然的太子人选。然而，最得万历宠爱的郑贵妃却在万历十四年生下了朱常洵，万历帝从此便有意改立朱常洵为太子，所以导致朱常洛迟迟不能被立为太子。

万历帝有意改立太子的传闻一出，顿时朝野舆论一片哗然。

户科给事中姜应麟首先发作，要求万历帝“册立元嗣为东宫，以定天下之本”（《明史》），结果被贬为广昌典史，因此事随后被贬的还有吏部员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孙如法。此后，六部和首辅等无数大臣多次奏请立常洛为太子，但绝大多数官员都被神宗以各种罪名贬斥。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年正月，万历帝加快了改立进程，下手诏给大学士王锡爵，要将皇长子常洛、皇三子常洵和皇五子常浩一并封王，以后再择其中善者为太子。王锡爵既怕得罪神宗，又怕被朝臣攻讦，于是耍了个滑头，上疏请三王并封，并由皇后抚育长子，如此长子就成了嫡子，试图以此两面不得罪。然而神宗只以前谕示朝臣，继续准备行三王并封之礼，顿时朝中大臣又一次大哗。

因为王锡爵这么说，就等于在明指朱常洛还需要补办手续，也就是质疑了朱常洛做太子的合法性，因此大臣们纷纷指责王锡爵阿谀顺上，王锡爵无奈自

劾请辞，而神宗也迫于众议收回了前命。

这件立储事，前后纷争凡十五年之久，至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十月，在孝定李太后的干预下，虚龄已二十的朱常洛才终于被立为太子，但万历帝同时也封了常洵为福王、常浩为瑞王、常润为惠王、常瀛为桂王。此后，福王又不赴封国长期逗留京师，于是大臣们又纷纷开始上书要求其按祖制离京赴封地居住，这其中以大学士叶向高、礼部右侍郎孙慎行争执得最强。

这一拖又是十几年，到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三月，在朝臣们的压力下，福王终于至封国。

此次立储风波，最终以朝臣们表面上大获全胜而暂时告一段落。

这场政治纷争，由于牵涉到未来的皇帝人选——太子，即所谓的“天下之本”和“立国之本”，因此又被称为“争国本”。在这场皇帝、后宫和大臣之间的对抗中，明廷的朝臣们集体表现出了大约是中国历史上士大夫们最后的一次风骨。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明神宗驾崩。

年近四十的老太子朱常洛，终于坐上了那张由大臣们千辛万苦为他争来的皇帝龙椅。

常洛于八月初一继位，是为光宗。然而到十二日，他就突然患了重病，十四日，谕册立东宫，准备于次月九日举行仪式。二十九日，病甚，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红丸”供服食。

九月初一，明光宗朱常洛一命呜呼。

他的年号“泰昌”，要到明年元月初一才开始，所以那一年依然是万历四十八年。这位终于媳妇熬成婆的大明老太子、新皇上，在位时间仅一月而已。

由于光宗是服用了李可灼所进的“红丸”后暴毙，所以当时的朝臣和后来的史家们，均认为这其中有明显的宫廷斗争迹象，光宗之死极为可疑，故此事又被称为“红丸案”。

“红丸”与朱常洛登基前发生的“挺击”两案，貌似尘埃落定其实悬而未破，又可说似未破而事已明，乃是两桩疑点多多的悬案，这两案与另一事件脉络均十分清楚但却没有确凿证据的“移宫”案，并称明代宫廷三大案，而这三大大案和之前的“争国本”事件，都和朱常洛有关，且对后来明季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甚至可说影响到了崇祯十七年大明朝的最后结局。

在对抗万历帝谋立朱常洵这长长十五年的“争国本”过程中，为了阻止万历帝废长立幼的企图，明廷的大臣士大夫们轻者辞职还乡以示不满，中者因上

书抗争而被斥责、杖打、罢官、降职、削籍，重者则被下狱问罪。然而他们还是一拨接一拨持之以恒地与万历帝抗争，且抗争之烈、人数之多、持续时间之长，在中国历史上大约也是仅见的。

那些书呆子士大夫们此种前赴后继，看起来好像永无穷尽的疲劳轰炸，其实是有优良传统的，这终于使得万历不胜其烦，但又无可奈何，于是他干脆一赌气对涉及此事者一概不予理睬，同时也不上朝、不见朝臣、不理朝政——朕不和你们争了，皇上我罢工了。

后世人都说，明之亡亡于万历帝，此言固为是，但是不上朝，罢工二十六年、三十一年不出宫门这等做法，其实不是他首创，而是学他爷爷明世宗朱厚熹，也就是嘉靖皇帝。

罢工这事，嘉靖帝早就干过了，他有一阵在长长的二十六年时间里，大约只上过四次朝。而外边那些大臣前赴后继对皇帝那永无穷尽的疲劳式轰炸，也一样不是首创，同样是学自万历皇帝的爷爷，甚至更远的祖宗辈手下的那些大臣们。



嘉靖皇帝

明世宗嘉靖皇帝登基时年方十五，他不是正德皇帝的儿子，而是正德帝的同辈兄弟，只因正德帝无子，他才得以做了皇帝。在当时，他的名声应该是不错的，不然也不会立他做皇帝。

但是，就因为这嘉靖皇帝是以正德帝的同辈兄弟身份登基，是庶出旁支继任大统，于是就闹出了一件大事。其实这闹事的缘由要搁到现在说，真是一点都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在那时节，简直是头上的天都要塌下来一般的大事，因此酿成了一桩

大风波。

那时候的朝臣士大夫们，你说他们食古不化也好，说他们有原则也好，总之一句话：他们认定了“为人后者为之子”，所以一定要嘉靖认他的伯父、正德皇帝的老子明孝宗为父，也就是要喊明孝宗为“皇考”，而对嘉靖自己的生父兴献王，则只能叫叔父，即“皇叔考”。

嘉靖当然是绝不会愿意的。

哦，敢情自己做了皇上，居然连亲生父母都不可以认了，那还了得？当下嘉靖大怒道：“父母可更易若是耶！”（《明史》）说起来，我觉着嘉靖皇帝这句话，着实是很有为人子的道理的，可那会儿的大臣们，却认为这不是做皇上